

《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评述

孙昌武

杨维中教授八十余万字的大著《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出版，是佛教研究的新收获，值得重视。这部新著作为杨教授多年辛勤研究成果，讨论的是中国佛教史的重大课题，成绩是多方面的。作者的著述态度和研究方法亦值得称许。只要简单翻阅这部书，就会知道作者下了多么艰苦、扎实的功夫。在时下治学普遍浮躁空疏的风气中，这种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至于研究方法，如作者所说，“特别着力于全面的文本解读和文本诠释方法的应用”（《作者的话》第4页）。这种综合使用“文献考据”和“理义辨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似有些保守、拙朴，但是寻本讨源，实事求是，对于基础研究是行之有效的。就固陋所见，有关如来藏思想汉语文献的研究，工作做得较系统、深入的主要是日本学者。但从总体看，杨教授这部书就论述的系统、全面、严密看，是超出此前中外学者的论作。

关于唐宋以来的思想发展，钱穆有个论断：

……在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文化史上，自唐以来一千数百年，广东有六祖，福建有朱子，几乎掌其枢纽，汇为主流；其影响力之大，其它各地区，皆莫与伦比。^①

这里“六祖”慧能是禅宗代表人物，“朱子”朱熹是理学代表人物，这两派思想确乎主导了中国历史所谓“近世”时期的思想、学术潮流——当然客观地说，佛教的禅不能和理学相比。又众所周知，中国禅宗宗义是奠基在大乘佛性论特别是如来藏思想的基础之上并加以发挥的。贾晋华在其近著《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版，2010年）里辟专章《古典禅教义及实践》阐发这一课题，可以参看。仅凭这些，就可以肯定如来藏思想不仅对于中国佛学，对于中国一般思想、学术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重要的。

杨教授这部书前面是说明著述宗旨的《导言》，以下分五章，内容分别是：第一、二章《如来藏经典的形成》；《早期如来藏经的思想及其在中土的影响》，重点论述了《如来藏经》、《胜鬘经》等七部经；第三章《〈大般涅槃经〉的主要内容及其如来藏思想》篇幅较长，论说也更细致，这是因为《大涅槃经》对于大乘佛性思想论说充分，在中国发挥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而深远；第四章《后期如来藏经的思想及其在中土的影响》，分别论述《圆觉经》、《楞伽经》、《楞严经》等三部经；第五章《如来藏论典的思想及其影响》，分别论述《宝性论》、《佛性论》、《大乘起信论》等三部论；最后是《结语：如来藏思想与“本体”论》；附录《参考文献》。从上述内容可以知道，这部书以汉语如来藏经论为探讨主要对象，按历史顺序分为早、中、后三期，重点在这些经论的内容及其在中国的传布、如来藏思想的发展及其所发挥的影响。这无论对于中国佛教史还是一般思想史以至文化史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在这部书里，作者对于如来藏思想在整个佛教中的地位的基本看法是：“如来藏思想是在中观思想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将小乘‘心性本净’说与大乘佛陀观相结合而出现的”。（第46页）这也是全书立论的基点。确立这个论点，作者首先力破古今各种“判教”体系中对于如来藏思想的地位的论断。关于历史上“判教”的局限，作者指出：“中国佛教的判教并非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究，而是带有创立宗派性质的创造性诠释活动”（第39页）；进而又指出：“在印度佛教中只存在如来藏系经典之流传，而并不存在独立的、可以与‘空’、‘有’二宗并立为三的如来藏流派”（第44页）。依据这样的看法，就不能把如来藏思想看作是印度佛教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而肯定它是自部派佛教的“心性本净”说、经大乘佛教佛性论逐步发展、进而融入中国佛教各学派、各宗派的整个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这样的结论超脱了传统佛学“判教”纷争的纠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确立如来藏思想的重要地位，从而提出一个佛教思想发展的主导脉络。这种看法或许还有进一步讨论、发挥的余地，但对于如何捕捉佛教历史活动的主导线索，如何把握佛教思想发展的脉络并从中总结历史规律，是多有启发的。回想二十多年前，哲学界曾探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问题，论争集中在是儒家还是道家。

^① 《谈国学——寿语堂先生八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卷第224页，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

弄清中国思想发展的主体,对于认识中国思想史、写作中国思想史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弄清佛教思想历史发展的脉络,对于认识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思想、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历史关系是十分重大的。

这部书对于如来藏思想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的基本看法是:“如来藏思想在中土最终占据佛学的主流。”(第49页)。如著者指出,“如来藏”一语往往被等同于“佛性”,不过“佛性”概念涵盖更广。如来藏思想可说是大乘涅槃佛性思想充分发展的形态。对于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来说,外来佛教无论是作为思想体系和文化系统,最有价值、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是它的心性理论。人们耳熟能详的范泰、谢灵运所谓“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何令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弘明集》卷一一),正清楚表明了对于这一点的清晰自觉。就中国思想整体发展说,魏晋是中国思想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人的“个性”的觉醒。鲁迅在他的名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精辟地说明了思想史的这一重大进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中,大乘涅槃佛性思想输入。小南一郎论述道教神仙思想的新发展,说到大乘佛教佛性思想的作用:

佛教在大乘佛教新的大发展中,导入了任何人都得以成佛这一前所未有的看法。在此之前,佛是超然的存在,修行者无论怎样努力最多只能或得阿罗汉果,根本谈不到成佛。在这样的精神史的状况之中,一种认为经过自己的努力即可得佛果的革命的思想孕育出来了,以这种新的精神水平为基础,佛教大大向前飞越了。^①大乘佛教的佛性新说影响道教,推动了人人可以成仙观念的发展;在儒学中,则是人人可以成圣。正是陆续输入的如来藏经论给这种肯定人的本性完满具足和人本来具有实现这种完善的超越能力的观念提供了更充实的理据。它们适应中国思想发展的需要,因而受到普遍欢迎。从南北朝后期到隋唐,杨教授所说如来藏思想后期经论《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圆觉经》等出现,其思想实际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佛教本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几个理论内涵更丰富的宗派,如天台、华严以至禅宗都讲佛性,都以如来藏思想做为立宗的主要典据、基本资源。这样,杨教授这部书对于厘清中国佛教思想发展脉络,对于认识佛教给予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提出了有说服力的、重要的见解。书中专章论述了《大涅槃经》的佛性思想,揭示这部大乘经在如来藏思想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中土的巨大影响;讨论《楞伽经》也用了较多篇幅,把它看作是如来藏思想发展后期的总结性著作,也特别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它对禅宗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也特别体现出如来藏思想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

值得称许的还有研究方法。作者立意做“正本清源式的剖析”(《导言》,第7页)。作者所指的“本”和“源”,就是阐述如来藏思想的十四部经论。对历史的研究,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弄清对象本来面目都是第一位的工作。后世当然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但历史研究的根本动机只能是为不断接近这一目标作出努力。佛教研究可供使用的的传世材料不外乎两大类:地上和地下的实物遗存和堆积如山的庞大文献群。而有关思想研究,基本文献的解读就更为重要。稍经尝试的人都知道,佛教典籍名相根深,论说繁复,加之异见歧出,异文众多,这种基础的解读工作既困难又乏味。杨教授这部书的主要篇幅用于基本文献的疏释。对于所讨论的十四部经论的每一部书,基本都是首先讨论其传译、版本、流传情况,包括译人、译时、译出背景、异译和真伪的辨析等;在此基础上叙述每部经论的内容要点;最后论述其对于如来藏思想发展的具体贡献及在后世流传情形、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在论述过程中,详细引录原典文字,有异译的经论多出异文,相互参照,加以讨论,做到言必有据。其中有的经如《央掘魔罗经》历来的研究较少关注,又没有前人注疏可以参考,解读更为困难。而如《胜鬘经》、《大涅槃经》,古人疏释和近人研究成果过多,如何分疏摘取,出以己意,更需要真知灼见。这种详实的解读功夫,避免架空立论或主观臆说,把论点、论据牢固地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如此对于文本的解读、分析,也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也突显出前面提到的作者在治学态度与学风方面做出的努力。

这部著作整体上具有相当的论战意味。这是因为百余年来佛学研究中涉及如来藏思想不断论争,这种争论总体上又关系研究中国佛教的观点和方法,影响巨大。早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相关经论的辨伪(关于《楞严经》、《圆觉经》和《大乘起信论》三部书的争论尤为激烈)。这部书把断定某些经论为伪的学者归纳为“中国的‘反传统’阵营”,实际参与者不只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人和西方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则有力主张“批判佛教”一派,肇端者是日本学者,又得到相当数量西方学者的相应。他们把一批主要的汉语如来藏经典判定为“伪经论”,进而颠覆中国佛教为“非佛教”。作者通过对如来藏经论的具体分析,证明如来藏思想乃是“真佛教”的核心内容,并且构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脉络。如上所述,这对于认识和厘清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①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第230页,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

不过本书大力探讨相关经论的真伪，似有可议之处。本来辨伪是佛教经录著述所考察的一个重点，也是百余年来中外佛教研究论争的一个侧重点。辨析经论“真伪”原本主要有两方面用意：一是“判教”中需要首先剔除中土伪撰，进一步判定哪一部经才是佛陀最终了义说法，从而确定建立学派、宗派的典据，这是以信仰为前提必须作的；再一种是为了探求佛教史在中国的真实传播、发展状况，区分外来译本和本土撰述，进而了解外来佛教在中土传播及其“中国化”过程，这也是佛教历史研究应当作的。但是，如果讨论仅限于中国本土佛教思想的发展，具体汉语佛典的所谓“真伪”关系就不大了。佛教本来是开放的文化系统。全部佛教典籍是经过漫长时期、在佛教传播的广阔地区不断创造出来的。就汉语佛典说，不论是外来翻译的，还是本土创作的，都是中国佛教长期发展遗留的、记载其发展实态的文字材料，无所谓本来意义的“真伪”。外来翻译的和本土撰述的价值和意义是等同的。这还不只是学术研究中所谓伪材料具有真价值之所指，实际中土撰述就是中国佛教的真经典。有些学者通过推断经论之伪，进而认定中国佛教之伪，是一种凝固、偏颇、形而上学的做法。而且又必须承认，这十四部经论中有几部是否中土撰述，依靠现有材料还不能确定。杨教授一概判定都是外来译本，结论还下得过早。例如对于《圆觉经》和《楞严经》，作者说：“这两部经不会是中土伪撰，而是如来藏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后期如来藏思想的成熟之作。”（第28页）实则在这个判断里，是否“伪撰”与是否“成熟之作”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来藏思想在中土发展，中土人士撰作出更成熟的著作，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无碍于肯定这些经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且符合宗教在不同国度、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创新的规律。

另外，这部书阐述如来藏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基本限制在佛教范畴之内，即主要是说明对于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两晋以来，随着佛教被社会上下广泛接受，特别是得到知识阶层相当普遍地欣赏、认同、信仰、借鉴、发挥，从而对思想、文化领域更广阔的层面逐渐发挥十分重大的影响。例如前面引述小南一郎的话表明的，大乘佛教，特别是它的心性理论的传播，对于道教新神仙思想的形成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又众所周知，汤用彤论述竺道生的贡献，指出他实开宋明理学的先河，而竺道生正是涅槃佛性思想的杰出的接受者和发挥者。充分阐发如来藏思想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探讨、明确它对于中国历史更广泛层面发展的作用与贡献。当然，这是另一个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有理由期待杨教授拓宽研究领域，学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

（作者孙昌武，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

游自勇

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里，余欣教授以其广博、深邃在年青一代学者中引人注目。《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导论外，正文分上下两编，收入作者从2005年以后发表及未刊的论文10篇，除第二章是与入合撰外，其余均为作者独立完成，并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上编题为“写本时代的学与术”，包括五章。

第一章《史学习染：从〈汉书〉写本看典籍传承》，原题《写本时代知识社会史研究——以出土文献所见〈汉书〉的传播与影响为例》。^①作者从考证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书》和《汉纪》写本入手，探究精英阶层传习《汉书》的方式、《汉书》如何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汉书》所承载的历史知识和道德规训如何渗透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与以往单纯从史学史、文献学角度考察《汉书》文本不同，作者引入了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将“写本时代”的文本特质蕴涵其中，要考察的是经典知识如何在社会上传播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其立意明显受到了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取向的影响，故其使用的材料除了正史、墓志外，亦延伸至敦煌蒙书、类

^①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3—504页。